

三、

项目
规划
建设
环境
影响
评价
报告
书

大
成

最为显著，三类问题的风险知觉存在显著差异(与“疾病与灾害”比较： $F(1, 100) = 10.24, p < .001$ ；与“生活环境类”比较： $F(1, 100) = 10.24, p < .001$)。在“发生可能性”维度上，个体认为“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性要显著高于“生活环境类”，检验结果分别为： $F(1, 100) = 10.24, p < .001$ ；“疾病与灾害”与“生活环境类” $F(1, 100) = 10.24, p < .001$ 。在“危害严重性”维度上，“疾病与灾害”被知觉为危害最严重，与其他两类差异显著(与“生态环境类”比较： $F(1, 100) = 10.24, p < .001$ ；与“生活环境类”比较： $F(1, 100) = 10.24, p < .001$)。

“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人知水信度，但在可控性、熟悉性维度上，“生态环境类”的风险认知水平显著高于“生活环境类”和“疾病与灾害类”。手工计算统计检验结果：“生态环境类”被知觉为发生可能性最高，危害严重性仅次于“疾病与灾害类”。全球变暖产生的经济、健康有关问题分析具体结论：“生态环境类”在影响范围、持续性、可控性、熟悉性、危害严重性等方面，风险认知水平，这一结论与以往研究一致。问题涉及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社会可能产生长久和不可控的天灾人祸，其危害持续的时间长，且面临一个严重的风险。生态环境类风险类型，其风险认知水平都高于“生活环境类”和“疾病与灾害类”，这反映了客观事实可能是难以预测的。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发生频率远高于其他问题，且不断出现，这一现象使我们不得不重视。

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发生可能性”维度上，“生态环境类”与“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发生可能性高于“生活环境类”，这一现象与客观事实可能是难以预测的。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发生频率远高于其他问题，且不断出现，这一现象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我们建议，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问题的风险特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例如，对于“生态环境类”问题，应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对于“疾病与灾害类”问题，应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对于“生活环境类”问题，应加强城市规划和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概率”有实质性的不同。此外，“民众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的概念也能够解释上述现象。个体的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包含认知成分和情感两个成分，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事件客观描述与加工，情感成分则倾向于以更主观的方式评价自身与事件的关系。这两个成分的作用不同。通常，媒介信息可能使个体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而人际之间的交流不仅对认知成分产生影响，还对情感成分产生影响。媒介信息对个体的日常行为影响较大，且个体经常进行交流，从而对情感成分都产生影响，并因此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水平。而“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信息传递作用主要针对认知成分，其影响范围更高。另外，个体对“生态环境类”“疾病与灾害类”问题的认知特征在综合控制感、熟悉性、危害严重性等方面，与“生活环境类”问题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问题的发生频率高，且对个体的控制能力，个体在认知程度上都高于“生活环境类”问题。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不同问题的风险特征，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3.2 因素分析
3.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探讨六个风险特征维度之间的关系，对本研究中采用的六个风险特征维度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结果 $\chi^2(10) = 10.24, p < .001$ ；KMO测度值为 $.80 > .5$ ，表明六个风险特征维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方差最大旋转，得到特征根和解释方差百分比。抽取前两个主成分(结果见表1)。

表1 主成分分析结果

主成分	特征根	解释方差百分比
第一主成分	4.52	30.13%
第二主成分	2.85	18.97%

第一主成分主要包含“发生可能性”、“危害严重性”、“可控性”、“熟悉性”、“影响范围”、“持续性”等六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对事件发生可能性和危害严重性的认知。第二主成分主要包含“可控性”、“熟悉性”、“影响范围”、“持续性”等四个维度，反映了个体对事件可控性和熟悉性的认知。

以“客观认识”作横坐标,“主动作用”作纵坐标,来标注一个环境风险条目所对应的位置。根据条目的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在条目频次的上下

处分界画出坐标轴,其对应的点分别是横坐标的...处;纵坐标的...处。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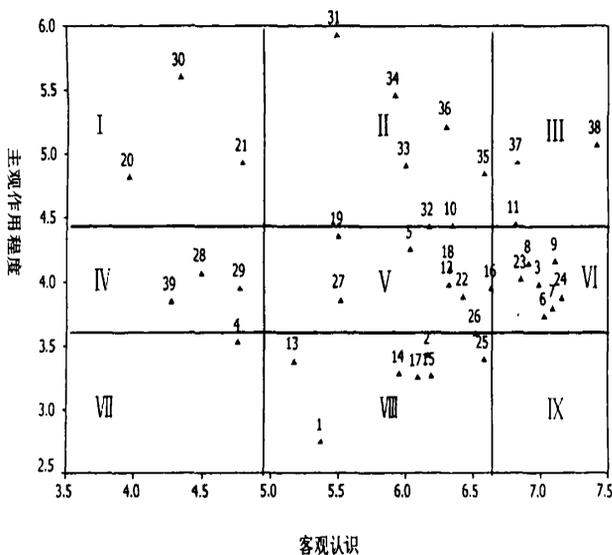


图2 环境条目的认知地图

象限II中分布的条目其风险知觉程度最高,即民众对...、传染性疾病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出极高的风险认知。这些问题不仅被知觉为影响程度大、持续时间长、极易发生、后果严重—处于客观性维度的上...%(数字大表示其客观性风险高),而且被知觉为非常陌生、难以控制—处于主动作用评价的上...%(数字大表示个体难以主动控制该风险)。因此,这些问题上处理不当,极易引起公众的焦虑与恐慌。

个体对分布在象限...中的条目,其影响程度、影响持续性、可能性、后果严重性等判断较低(下...%),而在可控性与熟悉性维度上却判断较高(上...%)。这些条目分别是地震、转基因食物、铁路运输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环境问题对于公众而言暂时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且难以控制,在实际操作中可将之放在次要的地位进行考虑。

象限中VII的条目被认为其客观危害程度较低,且也很容易被控制,这些条目主要涉及被动吸烟等方面的问题。该象限中的环境问题不属于紧迫的问题,可暂不考虑。

其他象限中的条目没有表现出极端的“客观认识”或“主动作用”,只能在风险沟通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加以考虑。该认知地图以两个综合的维度作为分析判断的依据,比单一维度的结果更能够有效地表征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特征。

4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风险程度指标”的有效性,并对六个维度进行因素分析后,发展了两个新的维度,分

别命名为“客观认识”与“主动作用”。该模型与...等提出的两维度风险评价模型有所区别,但与...等人提出的“二次评价”理论基本一致,都认为个体的风险认知机制涉及风险的客观情况以及个体与风险事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两个维度形成的框架下分析环境问题,能够获得各种环境问题的权重信息,由此形成的风险认知地图,能有的放矢地开展风险沟通工作,进一步丰富...等“过程导向”的风险沟通方式。

本研究运用因素分析的统计手段,将环境问题划分为“生态环境”、“疾病灾害”、“生活环境”三类,并检验了不同环境类别的风险认知特点。在对三类环境问题的风险认知特征检验中,“疾病灾害类”环境问题在大部分维度上的风险知觉都显著高于其他两类,“生态环境类”环境问题在较多维度上也被评价为风险较高,而“生活环境”在大多数维度上风险认知都偏低。综合前人提出的“风险认知决定因素”“自愿与强加的影响”以及心理学中的代表性的原则,我们认为,由于当时正处于...疫情高发期,而疾病造成的后果又十分严重,因此人们主观上对于疾病灾害的风险有着强烈的恐惧情绪,对“疾病与灾害”类风险认知较高;由于个体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控制能力较低,因此对其风险认知水平也偏高;而“生活环境问题”虽然举目皆是,但由于人们不仅能在认知层面上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解,还能够通过一些“情感性”交流方式降低对它的风险认知,因此,对该类环境风险的评价较低。

(下转第...页)

态说”，否定了元认知监测的特质说。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5.1 在问题解决领域，儿童的元认知监测判断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受材料、指导语、性别因素影响元认知监测判断两两之间又表现出显著差异。

5.2 元认知监测判断与策略选择具有高相关，即元认知监测判断水平越高，儿童策略的选择效果越好。

5.3 在不同的材料、指导语、性别因素上元认知监测判断与策略选择相关程度不同，表现出较复杂的关系，不具有跨任务跨情景的一致性。

6 参考文献